

文史知识

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

李泽厚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上)

卞孝萱

北京人化石发现记

贾兰坡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的十项重大成就

姚喁冰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考题及答卷评语选登

略谈古代书信的格式

刘叶秋

1985

WENSHI ZHISHI



文學研究要聯繫生活

實際

在文史知識中

吳組緝

八月十二日



宣傳祖國文化遺產，
建設社會主義精神
生活。

祝《文史知識》越办越好

廖沫沙 一九八〇
年冬



廖沫沙、吳組緝
同志為《文史知識》創
刊四周年的題詞



医药学院610 2 01472277

文史知识

1985年第1期

(总第43期)

• 治学之道 • 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们	李泽厚	3
• 文学史百题 •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上)	卞孝萱	8
• 历史百题 • 北京人化石发现记	贾兰坡	14
• 怎样读 • 出自地下的古史《竹书纪年》	盛冬铃	21
诗 纤秾与冲淡(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十七)	王明居	26
文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欣 ——说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霍松林	29
赏 神余言外——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赏析	李淮芝	34
谈柳宗元的《田家》诗	〔日本〕小野四平	37
• 文史书目答问 • 《古文辞类纂》	吴 鸥	42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怎样掌握与使用工具书	朱天俊	45
• 古文字学十二讲 •		
第四讲 甲骨学基础知识	李学勤	50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的十项重大成就	姚喁冰	55
文化 我国古代佐餐的主要食品——羹	王学泰	61
史 明皇室的殉葬制	牟小东	66
知识		
人物 晏子的幸运与不幸	季 城	70
春秋 元稹其人	董乃斌	75
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先驱宋教仁	秦 力	81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十三)

将军·校尉·州·郡国·县·乡里——东汉职官之二 孙 铨 86

• 古代民族志·富于反侵略传统的高山族 许良国 91

语言 丈人·夫子 黄金贵 96

知识 词义辨析:说“叹词” 张一恭 98

• 文史信息 • 台湾学者凌纯声对《九歌》的新见(100) 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通史》(100) 《中国文学通史》加紧编纂(101) 深圳大学文史研究宏图初展(102)

• 成语故乡漫游(4) • 太公钓鱼 周沙尘 102

成语 疾足先得(逐鹿中原) 戴 双 104

典故 捉衿见肘 韩又路 105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考题及答卷、评语选登 106

• 中国名著在国外 • 《文选》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 王晓平 111

• 书画欣赏 • 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 王玉池 115

• 文史信箱 • 略谈古代书信的格式 刘叶秋 117

• 文史研究动态 • 唐太宗问题研究近况 高世瑜 123

编 后 128

补白 6 则 人之才行(25) 缕葱丝(28) 合四十九人之智 胜于尧禹(41) 国有三不祥(95) 为将八弊(99) 长城究竟有多长(127)

封面设计:张守义

廖沫沙、吴组缃同志为本刊四周年的题词(封二) 钓鱼台(封三)



新春话知识

——致青年朋友们

李 泽 厚

李泽厚，湖南长沙市人，1930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等。

我喜欢和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但懒于写信。《文史知识》要我为青年们讲点“治学之道”，我深知自己确无资格来讲这种“道”，但推托不掉，只好借此机会聊聊天，替代一些回信。既然是聊天，也就不算文章，更非正式议论，只是些闲话罢了。

《文史知识》销路据说很好，而且愈来愈好。目前各种读书活动更非常之多，也愈来愈多。知识的重要性在广大青年心目中看来已不成问题。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吾生也有涯，其知也无涯”，我倒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了。面对书山册海，老师宿儒，艰难试题，各种测验，据说年轻人也颇有困惑恐惧之感。同时，我也经常听到对年轻人的一些批评：这个“不扎实”，那个太浮……，据说这也使某些想搞学问的青年同志们背起了精神包袱，总感到自己底子薄、知识少、没基础、不扎实。并且，据说要“扎实”，搞文史的就得从背四书五经、读《龙文鞭影》开始……。

事实究竟如何？年轻人是不是“不扎实”？究竟什么叫“扎实”？听得一多，倒不免使我有些怀疑起来。我记得年轻时，自己便亲耳听人批评过“郭沫若不扎实”、“冯友兰不扎实”、“侯外庐不扎实”……，言下之意是他们都没有“真学问”，万万不可学。我想大概是由于他们几

位的论著中议论较多而考据较少的缘故吧，或者是在考证、材料上有某些失误的缘故吧。因为郭沫若也搞过不少考据，但我却听说郭的考据“太大胆”、“太浮躁”、“绝不可信”，总之还是“不扎实”。这些批评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也还记得。嗟予小子，当时何敢吭一声，只好眼巴巴地静候批评者们拿出“扎实”的“真学问”来以便遵循。不过，也很遗憾，等了几十年，终于没有见到这个“真学问”。如今，倒不再听到有人说郭、冯、侯诸位“不扎实”了，但这帽子不知怎的又落到好些年轻朋友们头上，似乎成了某种定论。这使我不由得思索起来。

我想，这倒不一定就是人们的主观偏见或“嫉贤妒能”，而是有某种客观缘由在。这种缘由之一可能就是所持标准的不同吧。因为学问有时代性，知识有淘汰性。上下两代对知识和学问的观念、要求、需要不必尽同，但人们却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用旧尺来量新装，于是也就产生了扎实不扎实、有学问没学问的问题。今天，背不出“四书”的年轻人却在研究孔孟，有人皱眉头：“不扎实”。但是，在“四书”朱注也能背的前清举子眼里，能背“四书”白文又算得甚么“扎实”？今天年轻人不搞考证却又研究文史，有人发脾气：“不扎实”。但是，在王念孙父子眼里，现代“扎实”的考证又真有多少分量？章太炎也许还会嘲笑今天的教授们连字都不认识却侈谈学问吧？实际上，现代青年们学外语，懂科学，知道耗散结构和第×次浪潮，我看，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比王念孙、章太炎，也自有其优势和“扎实”在。那么，又何必如此自愧勿如，诚惶诚恐呢？年轻人应该自信，不要被庞大的中国故纸堆吓倒了、压坏了。不必老念念于自己基础不好、没有知识。其实，中国文史方面的书，两三年就可以读很多，而有些知识则毫无用处。例如某次读书试题中的“知识”——“《红楼梦》中一共有多少个梦”——便属于此类。大脑毕竟有限，缺乏这种连红学专家也未必须知的“知识”，又何必羞惭于自己读《红楼梦》读得“不扎实”呢？

年轻人应该具有自己时代所要求、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必处处向老辈看齐，不必过份迷信甚么“师承”、“亲授”。老师有的知识可以不必全有，老师所没有的知识有时却必不能无。研究中国文史，也该懂外语、学科学，明了世界大势，“中国书都读不过来，哪有工夫念外

语”之类的论调，我以为是不妥的。记得有个材料说，陈寅恪回国时去见夏曾佑，夏说，你懂几国外语多好，我现在感到没书读了。陈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中国书那么多，怎能说没书读了呢？但后来，陈暮年时却深感夏的话有道理，因为中国书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基本东西。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这使我感到鲁迅当年说“不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使人消沉下来等等，也并不完全是气话。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史的青年也要走向未来。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来看待、衡量和估计知识学问的扎实或不扎实。例如，我们今天确乎还需要各种“活字典”和各种博闻强记举一援十的学者专家，但这是不是文史领域中的唯一的方向、标志和道路呢？老实说，如果比死记硬背、比知识量的多寡、字典的大小，人大概比不过将来的机器。前人所艳称的某些“扎实”的学问，至少如编引得、造年表以及某些考证之类，将来很可能要让给机器去做。又譬如，以前读书人都讲究抄书，所谓买书不如抄书，鲁迅就抄过书。抄书当然非常“扎实”，非常有助于知识获得的准确牢靠，但在知识不断爆炸、信息极为庞大，连复印机、计算机也忙不过来的现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强调不抄书、不背书就“不扎实”的老套吗？

将近百年前，严复对照中西异同以倡导改革时，除指出“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中国尊君而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等等之外，还说过：“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现在这一点似乎仍然如此。只要你掌握、罗列、知道的材料多，能繁征博引，便是“有学问”，而值得或可以吹捧炫耀。否则便不行。我总感觉这好像是原始社会的遗风。在原始社会，谁的胡子长，谁的权威就最大。因为他活得长，经历的事情多，“学问”当然也就最大。但近现代社会却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创新家经常有青年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学问、知识、经验，却偏偏能作出非常重要的发现或发明。从爱迪生到爱因斯坦，我看如果讲知识、学问，恐怕就比不过那些胡子长、头发白的教授专家们。但真正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却是他们的“新知”，而并不是那些教授专家们的“多识”。

其实，在中国也有例子。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检查起来，

便“征文考献，辄多谬误”，“其读书亦大卤莽灭裂矣”（《余嘉锡论学杂著》卷下）。大家如苏东坡，当年也经常被人（是刘贡父？记不清了）嘲笑有各种学问上的错漏。游谈无根，不扎实，再抄引另一个故事如下：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对曰：‘何须出处！’……公赏其豪迈。”（一作“坡曰……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见《宋人轶事汇编》中册）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何须出处”、“意其如此”、“读书亦大卤莽灭裂”以造成各种基本知识的错漏欠缺；我自己便强调过：“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美学译文丛书序》）因此这里我想说的不过是：不要迷信，不要困惑压抑在“不扎实”、“没学问”的重力下而失去如欧阳修称赞苏轼的那种年轻人所具有的“善读书善用书”的“豪迈”锐气。因此我倒非常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二十七岁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中译本《生活与美学》）也是以“卤莽灭裂”地贬低艺术，使得学问甚大的老一代名作家屠格涅夫气得发抖的故事；我也仍然相信毛泽东讲的年轻人不要怕教授是至理名言（我如今也是教授，大概不致有某种嫌疑）。

我并不想把“新知”与“多识”、“创造”与“学问”、年轻人与教授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如在《美学译文丛书序》中所认为的，创新必须有学问。在一定意义上，新知是建筑在旧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想说的又不过是：创造需要知识，但知识却并不等于创造。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从知识到力量，其中还需要某种转换。即是说，要使知识（对象）变成力量（主体），还得要有某种科学的选择、组织、建构、融化的工夫，这样才使知识纳入你的智力结构，成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自由驾驭，而不只是象机器那样被动地贮存，凭外在指令来输入输出而已。也就是说，要善于读书，善于吸收融化知识，善于主动地选择、建构、运用和支配知识，使合规律性的

知识趋向于、接近于、符合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创造。

这里面，问题就很多，就很值得了解探究。青年们在贪婪地热情地吸取知识时，最好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以采取最适合自己的具体方法、途径、方式，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特征去做出可能人各不相同的选择和考虑。例如，包括做学问，当学者，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类别。海耶克(F·A·Hayek)曾把学者分为头脑清晰型和头脑困惑型两种，也有人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大体说来，前一类型善于分析和讲授，知识丰富，论证清楚，博闻强记，条理灿然。后一类型则相反，他不见得能记得很多知识，他的论证、讲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涩。他经常忽视或撇开各种细节，却善于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观念或关键，其中蕴含着或具有着极大的创造性、新颖性、原动性。前一类型更善于复述、整理、发展前人的思想、学说和材料；后者却更多沉溺于执着于自己所关注的新事物、新问题，而不知其他。如果借库恩(Thomas Kuhn)的话，前者大抵是常规科学，后者则属创造范式(paradigm)。前者无论在课堂上、舆论界、同行中一般容易被欢迎，后者却常常不为人所注意或接受。当然，这种二分法只是某种抽象化了的分类，在现实中，这两种类型、这两种因素经常是交织、混合在一起，只有程度和比例不同的差异而已。本文之所以讲这些，也只是想说明学问并无一定之规，知识也非僵死之物，“治学之法有多途……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拙作《走我自己的路》，《书林》1982年4期)，“研究题目、途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认为只有考据才算学问，其他都是狗屁、空谈……；也不能认为考据毫无用处”(拙作《读书与写文章》，《书林》1981年6期)。对知识，恐怕也是如此。

总之，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新而学知识。青年恰恰是创新欲望和能力最旺盛的时期，不要错过啊。

《文史知识》以知识为刊名，我却讲了这些即使不算反知识，大概也属非知识的闲话，不识时务，必将挨骂。但既然编辑同志如此热诚，那我又岂能退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可能有点阿Q精神，也罢，只好如此了。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上)

卞孝萱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叛乱，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削弱了唐朝的军事力量。叛乱虽然平定，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防空虚，时有外敌入侵。战祸不停，赋役繁重。加上土地兼并激烈，农村两极分化，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这是中唐新乐府运动所以兴起的社会根源。对此，学术界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认识，还嫌不够，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新乐府运动不迟不早、恰恰兴起于号称“中兴”(《旧唐书·宪宗纪下》)的元和初年呢？所以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一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这个论断，非常精辟。遗憾的是，范老没有说出“宰相”和“朝臣们”的姓名。而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在裴垪(jì)领导下，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步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

《旧唐书·裴垪传》中说：“(裴垪)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nì)，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宪宗)垂意听纳。”封建史书对

裴垪相业的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元和初年唐朝由中衰暂时转向“中兴”，确是与裴垪集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裴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有才能的、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李绹、崔群、韦贯之、裴度，还有元稹和白居易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批评朝政，主张改革时弊。作为诗人的元、白，还另有特色，就是：他俩除了与他人一样陈述政见之外，还以文学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兴起了新乐府运动。

唐朝的文人，中进士或明经以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身、言、书、判”合格，才能进入仕途。元、白都受裴垪赏识，同登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曾在悼念裴垪的《感梦》诗中说：“唯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从此始。”元和元年（806），元、白又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前，他俩同在长安华阳观进行准备，“揣摩当代之事”（白居易《策林序》），“指病危言”（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自注），就是遵照裴垪对他俩的指示。

此后，元、白一直受到裴垪的提拔。《旧唐书·白居易传》说：“自讎校（指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至结绶畿甸（指元和元年为盩厔县尉），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白居易也曾写过一首《梦裴相公》诗，与元稹的《感梦》诗异口同声，感激裴垪对他俩的知遇。这种交谊，仅仅是私人的感恩戴德吗？不，元、白与裴垪，抱有挽救危亡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白居易曾高度评价了裴垪的功业。元和三年（808）九月，裴垪为宰相，白居易为宪宗所撰的《除裴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说：“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唐朝最著名的四个宰相。白居易期望裴垪继之而起，“罔俾房、宋专美于前”。他把“中兴”唐朝的希望，寄托在裴垪身上。

在裴垪的领导、支持下，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对皇帝进行了勇敢的谏诤，向权幸进行了猛烈的战斗。

元和三年，应制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的对策，忤犯了权幸裴均、李吉甫等，考策官韦贯之等被贬为外官，覆策官裴均被免内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言裴均、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不当黜责。

四年，宪宗因久旱，欲颁“德音”。李绹、白居易奏请：降系囚，蠲(juān)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宪宗采纳二人意见。

白居易曾多次在谏诤中指责皇帝：“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论裴均进奉银器状》）“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论承璀职名状》）

五年，元稹勇于弹劾，不避权势，遭到打击，自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李绹、崔群均言元稹不当贬，白居易累疏切谏，《论元稹第三状》中大声疾呼：“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

在一次谏诤中，他甚至还当众指摘宪宗：“陛下错！”使宪宗不能忍受。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元和初年白居易对皇帝的谏诤，对权幸的战斗，是与裴均集团成员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元稹也是这样（参阅拙著《元稹年谱》，齐鲁书社出版）。裴均“好直”，一贯奖励官员行直道（他对无所“献纳”的严休复，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元、白才有可能勇气百倍地对皇帝进行谏诤，对权幸进行战斗。元稹虽因此贬谪，也毫不畏缩，宣称“谏死是男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而裴均死后，元稹就变节了，承认“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他还叹息：“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司马九江城，无人一言理。”（《感梦》）所谓“道”，指直道，即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白居易的表现怎样呢？裴均死后，白居易写过“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的诗句。诗的题目是《适意二首》，实际上内心是一片苦闷。他与元稹不同的是，他不愿“诡遇”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裴均的存亡，影响元、白的政治态度如此深巨，从而反映出元和初年元、白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与裴均的支持分不开的背景。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屡降玺

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指宪宗，“宰相”指裴垍。“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指讽谕诗。因“难于指言”而创作讽谕诗，可见讽谕诗是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白居易依靠谁将讽谕诗“闻于上”呢？当然是这位“正人”宰相了。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裴垍是白居易元和初年大量创作讽谕诗，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将白居易的《新乐府》与他元和初年的“启奏”、《策林》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例如：

《新乐府》	“启奏”、《策林》
《上阳白发人》小序：“愍怨旷也。”	《请拣放后宫内人》奏
《两朱阁》小序：“刺佛寺寝多也。”	《策林》六十七《议释教》自注：“僧尼。”
《盐商妇》小序：“恶幸人也。”	《策林》二十三《议盐法之弊》自注：“论盐商之幸。”
《鹖九剑》小序：“思决壅也。”	《策林》三十七《决壅蔽》
《采诗官》	《策林》六十九《采诗》

白居易《寄唐生》诗中说他作“乐府诗”是：“非求官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既然“启奏”、为制科考试作准备的《策林》、“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都是白居易向皇帝陈述政见之作，写作时间又相近，其精神当然是相同的。这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情况，由此出发，才能理解新乐府运动的成就和局限性。

表现在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上：白居易把讽谕诗当作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所以他明确提出《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就是说：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以诗歌推动政治改革，不是为诗歌而诗歌，这对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具有积极意义。他标举“六义”，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批判“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诗歌，提出“其辞

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这些对新乐府运动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白居易把讽谕诗当作谏诤的手段之一。离开这个特点去分析《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隔靴搔痒的。从政治上说，中唐新乐府运动是在裴垪的支持下兴起的，它可以说是裴垪集团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予以应得的评价。

二

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决定于中唐的社会状况，也依借于诗歌发展的内在条件。

我国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称为“乐府”。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也称为“乐府”。后来，魏、晋至唐可以入乐的诗歌，以及仿乐府古题的作品，统称为“乐府”。“乐府”由官署名演变为诗体名。

郭茂倩《乐府诗集》有“近代曲辞”，首列隋炀帝《纪辽东二首》。又有“新乐府辞”，首列初唐谢偃《新曲》（《全唐诗》作《乐府新歌应教》）。为什么出现新曲、新歌呢？乐府诗的乐章固定，歌曲的牌名也固定。有些诗人不愿受旧曲调的限制，自度新曲，创制乐章和歌词。初唐以来，不乏其例。从乐府诗的发展来说，这是变革的先机。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政治上的大变动，在文学方面也发生很大的影响。杜甫写于战乱之中的《兵车行》、“三吏”、“三别”、《悲青坂》、《悲陈陶》等诗，完全摆脱了古题乐府的束缚，使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获得更多的自由，能够更好地为反映现实服务。元稹《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赋拟古题。”所谓“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是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来确定篇名，不受任何乐府古题的限制。这是杜甫创作《兵车行》一类作品的重要特色，也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甫的主要原因。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即事名篇”的体裁，以加强诗歌的战斗力量，正适合时代的需要，所以古题乐府在元、白手里正式发展新题乐府了。杜甫可以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行者。另外，元结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亦不能忽视。

杜甫写过《同元使君〈春陵行〉》，对元结（次山）的政事与创作，给予崇高的评价。元结《二风诗论》说：“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系乐府十二首》序云：“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他明确提出诗歌的规讽教育作用，为元、白发起新乐府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元结还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诗友。他赞美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朋友后生，稍见师效”（《篋中集序》）。他曾与刘湾等“咏歌夜久，赋诗言怀”，当场号召：“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刘侍御月夜宴会序》）元结不仅个人努力，还注意团结诗友一齐奋斗，给元、白发起新乐府运动以组织上的启示。

杜甫、元结之外，顾况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先行者。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元稹为“入室”，顾况为“升堂”，并说：“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法度”相同一语，揭示了时代较前的顾况已经先兆了元、白诗歌的某些特色。

刘熙载《艺概》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间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他只指出杜甫、元结、白居易的乐府诗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嫌不够。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角度来说，（一）杜甫发现元结，“感而有诗，增诸卷轴”。（二）元结发现沈千运等七人，编其诗为《篋中集》，“传之亲故”。（三）白居易发现唐衢、邓鲂（参阅白居易《伤唐衢二首》、《读邓鲂诗》等）、李绅（公垂）、元稹等，就联合起来，共同创作，此唱彼和，扩大影响，一时形成风气。元结的做法，比杜甫进了一步；白居易的做法，比元结又进了一步。正是在白居易的提倡下，把“新乐府”的创作，从个人的分散行动，推进到一批人共同行动的新阶段，这就是我们所称道的中唐新乐府运动。

谁都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变成今天这样的。北京人化石的发现为“劳动创造了人”提供了真凭实据。本文作者贾兰坡先生便是继裴文中先生之后，又一位北京人头骨的发现者，他为我们叙述了——

北京人化石发现记

贾
兰
坡

一、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上 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裴文中先生在他写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他当初发现北京人完整头骨化石的情景：

我们若从山顶望下去，见猿人洞口之深^①，及峭立的绝壁，已有些令我们害怕。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寸一尺的移去，土和石都是我们一筐一筐的抬出。现在看来猿人洞很深很大（最近因雨水冲积及悬崖落石，已不能下去了），当我们初开的时候，只是仅能容人的小孔。并且一部分尚为砂土所填满，仅有一个薄隙。当洞口方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深浅，于是我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腰上用绳子系好了，上边用许多人拉着绳子……我下去之后，见洞内化石非常之多，高兴极了。那

时已到十一月底，天气冷了，应当停工了，然我决定再继续几天。这正与古诗上所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

想不到，我们开掘猿人洞的第二天，在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余，竟自发现了猿人头骨。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

① 这不是真的洞口，而是在当时把洞穴中的堆积挖了一个井式的竖坑。

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气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分被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①，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很薄，而猿人头骨异常的厚。若说猿人是人，真冤枉！从这一点看来，他真不象人。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听人说故事。当我1931年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时，离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时间只有一年多，和工人聊起天来，他们能滔滔不绝地讲述发现时的细节。第一个见到头骨的人是刘义山，他原来是个石匠，人很正直又好好学习，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前他已成了一名发掘化石的技术工人。他认识很多兽类的牙齿，我曾请教过他如何发掘和怎样辨认化石，他不厌其烦讲给我听。

据说，他们当时在洞穴中段靠近北裂隙的地方，露出一段裂隙，大约深有四米，直径不大，里面只能容纳两个人发掘。不用说是傍晚，即使是在大白天，里面也是漆黑的。由于没有悬挂汽灯的地方，只好每人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握着工具发掘。刘义山和另外一位技工已经发现了很多兽类化石。上面的坑沿上站着一些人把发掘过的松土和化石一筐一筐地拽上来。刘义山忽然见到一个圆圆乎乎的东西，既不是鹿也不是虎，他挖了几年化石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东西。他立即喊叫裴文中，裴文中下去一看，就大声喊叫起来，是“人头”！即亲自动手发掘。愈发掘露出来的部位愈大，看得也愈清楚，才肯定是一个完整的猿人的头盖骨。

关于北京人的头骨化石，在1928年和1929年虽然都发现过，但都很破碎。1929年初发现的一件残破头骨，由于被硬土所包围，运

① “中国猿人”一词是最初给的“属”级名称，从“*Sinanthropus*”一词译来。“sin”是希腊字，意为“中国”；“anthrop”也是希腊字，意为“人”，按原意应译为“中国人”。后来这“属”名已废弃不用，和爪哇人合并，正式学名改为“*Homo erectus*”，意为“直立人”。“北京人”一词是在头骨发现之初给的通俗爱称。